

新时代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实现路径

■张丽华 鲍宗豪

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模式,能为个体提供健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自觉对培育关心他人和社会、拥有良好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的社会公民,具有道德规范和品质培育的伦理意义。在国外,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逐步成为全世界的价值诉求;在国内,传统单位共同体的瓦解和共同体价值自觉的缺失正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形成了社会原子化风险。通过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居民参与度等措施来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进而形成新的社会联结以凝聚人心和提高生活品质,正成为新时代的价值诉求。

[关键词]新时代;原子化风险;社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01-023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0年来文明城市创建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15ZDC007)

张丽华,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鲍宗豪,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7)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繁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单位体制改革转变了经济纽带型“单位共同体”对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结,消解了“单位共同体”作为中间组织的社会结构,个人从组织严密的“单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变成自由“社会人”。而作为凝聚力量的价值共识的淡化则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社会原子化风险,使人们在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同时,出现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不升反降的状态。因此,构建新型共同体,重塑新的价值共识,成为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治理目标的新时代价值诉求。现代城市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场域,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同时也具备形成新型共同体的空间特点,因此重塑“公共精神”,通过社区自治和提高参与度等途径,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以形成新的社会联结结构,为游离个体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契机,也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价值诉求。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价值分析

在我国单位体制改革之前,通过国家意志建构的单位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将人们联结在一起,以国家意志为核心的集体意识成为“单位共同体”的价值自觉,这种以国家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单位共同体”价值自觉影响着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观。单位以其严密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其运行机理是,作为单位人,要在单位共同体中生存、发展,就必然要接受单位的制度和规则,认同并内化与单位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否则便无法融入共同体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强行形成的价值自觉,避免了个体价值观经历价值自发的混乱阶段,使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做到比较明确和一致,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牢固社会联结结构和共同体成员特殊的社会关系模式,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的单调统一,个体的个性被约束,社会也失去了多样性。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必然要突破这种传统共同体的约束,单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作为社会联结的中间组织功能不断弱化,能够取代单位的社会中间组织又没有及时形成,从而出现国家与个人之间纽带缺失的状况。个人的社会诉求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向上反映,个人的价值观也失去了共同体价值自觉的约束与引导。这使许多个体的价值追求始终处于自发状态,在没有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情况下,形成由自发心理或本能决定的具有直接性和单纯功利性的价值倾向。在这样的价值自发状态下人们变得自私自利和急功近利,与追求人类共同体幸福的价值自觉不同,人们对长远的未来没有预见和规划,同样也就对未来的共同愿景缺乏信仰,没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心,游离于组织之外,那些无法以常态的社会行动达成的利益诉求,便以坑蒙拐骗等越轨和失范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而市场经济的推进不仅瓦解了传统的共同体,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多元价值观,让当前脱离传统单位体制的人们陷入社会成员原子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不稳定局面,引发了社会规范约束力降低等一系列社会原子化风险。

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社会追求物质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当物质利益的天平向精神满足倾斜时,社会原子化风险便成为当前共同体理论再次被引起重视的现实出发点。当前,在互联网和资本的双重推动下,个体的“脱域”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沙化、人际疏离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漠视,使人们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心灵的孤独无依,并纠结于追求个体自由和寻求共同体庇护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个体害怕回归到抹杀一切个性的集体主义至上的传统“单位共同体”中;另一方面,个体又难以独立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离开共同体的庇护,个体也就失去了自由的保障。因而,影响人们生活品质的最大问题在于:一系列由共同体缺失所引发的社会原子化风险,形成社会沙化的人际疏离现象,降低了个体的归宿感和安全感,拉低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促使构建新型共同体成为新时代的价值诉求。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区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层单位,也是新型共同体的落脚点。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对提高生活品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既能让个体获得自由发展又能整合多元价值,并提供精神归宿的新型社区共同体不仅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理论价值,因为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既能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新视角,又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倡的构建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实践平台。通过构建社区共同体,重塑价值共识,可

以缓解当前国家、市场和个体的矛盾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供新角度。同时,构建社区共同体,能够再组织原子化的个体成员,使个体诉求的合理表达获得有效渠道,个体自由发展得到有力庇护。当社区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生幸福时,就能激发居民对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向往,从而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人们在用行动表明对新型共同体的急迫需求,这正是通过构建社区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现实出发点。新型社区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产生的价值诉求。在中国语境下,通过党建引领来重新凝聚价值共识,整合多元的价值观,可以为个体提供精神归属和正确的价值追求引导,能够以多方协作的形式吸引个体主动参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活动中来,从而为探索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形式,构建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实践平台。

二、建构新型社区共同体的可行性分析

新型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是以整合多元价值为取向和最终归宿的协作型共同体,共同体可以“在个体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之间建立相同的平衡”^{[6](P190)}。这既能体现出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也能反映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评价新型共同体构建成败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达成整合并满足多元价值诉求,为共同体成员提供精神归宿的目标。因此,在新时代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一)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1.新型社区共同体从契约型“机械团结”转向协作型“有机团结”,超越于传统“单位共同体”,形成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强大生命力。滕尼斯提倡的有情感联结的共同体,指出共同体应该是一种基于个体价值多元化基础上的“有机团结”,而非仅仅是基于工具理性和契约基础上的“机械团结”。传统“单位共同体”是典型的“机械团结”式共同体,由同质性很高的成员组成,过度强调集体主义,抹去了个性的差异,抑制了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其特点为:一是单位通过一套完备的组织制度为单位成员提供经济保障和荣誉等精神奖励,将每个单位成员都牢固地纳入共同体中,并将单位的共同意志融入每个成员的价值观中,形成集体价值意识对个体价值意识的覆盖;二是单位通过给予每个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强化了个体与单位共同体的利益相关性,形成基于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三是对单位有着严重生存依赖的“单位共同体”成员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依靠组织关系建立,个体几乎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由此形成的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共同体”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大锅饭局面,以及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行覆盖,不仅约束了个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而且抑制了社会活力的激发和社会多样性的产生,这正是传统“单位共同体”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单位共同体”消失后,社区成为国家权力下沉的载体,是游离于“单位共同体”之外的人们重新汇集的区域。帕克将社区描述为“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1]这意味着社区与单位一样具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但社区共同体超越于传统“单位共同体”的地方在于:一是社区共同体是超越于经济契约型共同体的协作型共同体。社区不是一个经济体,不是通过经济契约形成的共同体,没有经济体强制的管理结构,个体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避免了个体因经济依赖关系而被迫接受集体意识制

约的被动局面,多元主体可以通过协作来共同处理社区事务。二是社区共同体是包含个体自由的共同体。社区人员流动性大,而且任何社会成员都有可能纳入社区中,优质社区共同体可以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产生资源汇聚效应,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加入其中。因此,社区一方面与单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使社区共同体成为后单位时代承接“单位共同体”社会功能的良好载体;另一方面,与单位不同,社区共同体是建立在居民多元价值基础上的新型共同体,可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共同体,在多方协作和利益互动中形成创新发展的动力,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新型社区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以整合多元价值为取向和归宿,并以促进价值共识的形成和公共价值诉求的满足为目标的共同体。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促进居民现代化的实现,可以使居民的价值追求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进而推动居民从被动参与社区共同体活动走向主动参与社区共同体活动,形成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充沛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私人化的个体性意味着本质上的不自由”^{[2](P55)}。离开共同体的个体会处处受约束,处于资源获取困难、社会关系不确定和没有安全感的被动境地。马克思提倡的是一种保持个体自由的协作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点是成员对共同体事务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参与。在资本逻辑的冲击下,由于生产单位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社会原子化趋势,使个体的独立性增强,出现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状况。社会成员的多元价值取向意味着社会凝聚力的弱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导致社会成员中出现只关注个人私利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自私自利行为,从而阻碍新型共同体的形成。因此,新型社区共同体是以整合多元价值为取向和最终归宿的共同体,而评价新型共同体构建成败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达成整合并满足多元价值诉求。在社区共同体中,党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价值观引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组织覆盖优势和政权优势一方面可以为各方协作提供平台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多方协作提供制度保障。在党建的引领下,通过培育现代化的居民,使社区多元主体可以进行有效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处理,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居民等多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和才能,主动参与到社区共同体的活动中来,形成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活力机制。

(二)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现实依据

1.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社区治理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较好的外在环境基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为整个社会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社区治理的资金来源有了保障,社区物质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重塑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基础。同时,社区治理水平取得较大的提升,不仅治理结构由行政一元主体变为多元主体,提高了治理效率和民主性,而且治理方式也变得更加科学与智能化。高科技手段在社区治理中的运用,使各种社区虚拟公共空间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虚拟公共空间与现实公共空间相结合,为整合多元价值、重塑公共精神提供了有效的再组织平台。

2.社会分工发展推进的对社区治理多方合作的新需求,为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奠定了价值共识基础和动力机制。虽然社会分工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打破了社会联结,扩大了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但是社会没有瓦解,这是因为“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3](P134)}。“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

系。”^{[31] (P24)}也就是说,分工合作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联结方式,是构建新型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在作为居民日常生活领域的社区内,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工协作的互动关系。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激活基层社会活力。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和激发基层社会活力的要求,都促使政府需要在社区找寻合作对象以帮助其贯彻治理方针政策、维护社区秩序,并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提供公共服务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社会组织则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发展需要,愿意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合作,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而作为社区自治主体和服务对象的居民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更希望在社区治理中通过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获得利益的满足和社会归属感。也就是说,社区共同体为多元主体的互动和价值共识形成提供了良好平台。当前,在社区共同体平台上通过推动三方的利益互动已初步形成;希望社区拥有良好的秩序、美好的环境和获得更好的发展等价值共识。换句话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已成为社区共同体的公共价值诉求,这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区共同体奠定了价值共识基础。而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则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和满足提供现实平台。

外在环境的改善和内在价值共识的形成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同时进一步促进公共价值共识的形成和对公共价值诉求的满足则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价值所在。因此,通过社区自治打造一个新型的社区共同体,将原子化的社会人组织起来形成新的社会联结,进而消解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社会解构风险,具有现实可行性和较大的价值内涵。

三、新型社区共同体建构面临的难点分析

在资本逻辑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当前要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将面临较多阻碍,因为资本逻辑和互联网对城市生活方式形成的巨大冲击,解构了传统共同体存在的社会基础,人们在现实中崇尚个体自由并不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形成重塑新型社区共同体的难点。

(一)资本带动人口无序流动,公共生活缺失阻碍社区成员主体意识的形成

“单位共同体”消散后,资本流动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原来存在于“单位共同体”中相对固定的公共生活也随之消失,公共生活的缺失造成公共精神生活匮乏并形成价值认同障碍等一系列问题。快速流动的人口因为缺乏共同体的联结而无法获得价值认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使得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降低,人际交往呈现碎片化、虚拟化的趋势。加上公共生活空间的缺失,使得社区居民对自己是社区自治主体的意识淡薄,价值追求处于自发状态,利他的公共契约精神被破坏,共同价值追求更加难以确立。典型表现为:当前大部分社区成员只将社区当作临时住宿的地方,并没有意识到社区是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的价值自觉是建立在每个共同体成员价值自觉的基础上的,如果大部分个体的价值追求都处于低水平的价值自发状态,大家无法形成“默认一致”的利他即利己的共同意志,那么共同体就无法确立。即使社区具备形成共同体的物质空间也将很难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从而无法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来填补“单位共同体”消解后的社会中间组织联结空白,无法重新建立国家-中间组织-个人的社会宏观联结。

(二)“浮萍式”生活方式,淡化了熟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性和互利的潜在契约精神,阻碍公共精神的形成

资本带动的人口无序流动,使城市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淡化了熟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性,破坏了“互利”的潜在契约精神。一方面,利益相关性降低,造成社区成员因缺乏对共同利益

的追求而难以达成共同意识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对“互利”的潜在契约精神的破坏,阻碍了社区成员形成“利他即为利己”的价值共识,形成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自发状态,从而影响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利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共同体价值自觉的核心因素。当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时,“浮萍式”^[4]漂流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将很难融入当地社会,更无法将身边的人当作熟人,当作可以互帮互助的人。因而,人口的无序流动不仅破坏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破坏了公共生活中的潜在契约,形成了不利于“利他”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潜在契约告诉人们如果你遇到困难别人也会帮你,可如果潜在契约被破坏,让大家认识到,你帮助别人,别人未必帮助你,而且可能讹上你,人们就会放弃利他的行善行为”^[5](P405-406)。这种陌生人社会的潜在契约丢失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人们无法互相信任,更无法形成价值认同,进而阻碍了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形成。

(三)快餐文化生活方式破坏了价值自觉形成的文化环境

文化生活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审美观和价值观,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追求,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石,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源,更是价值自觉形成的基础。当前资本逻辑支配的高效生产,严重挤压了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高速的生产节奏和流动的生活空间,使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合适的空间去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只能“宅在家中”在网络空间享受视频、图像、音乐、小说等电子娱乐产品提供的快餐式文化生活。这样的文化生活方式,不仅形成“脱域化”的虚拟社会交往方式,淡化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系,而且制约了个体自身修养的提升,削弱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破坏了追求高尚的价值自觉形成的文化环境。

快餐文化生活的最大特点是只求速度不求内涵。工作的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无法静下心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更无暇顾及推进社会发展的共同体价值自觉所提倡的长远的价值追求,文化生活变成枯燥乏味又紧张快速的工作之外的调味剂。人们只求获得短暂的身心愉悦和精神放松,并不追求高品质但耗时费力的文化享受和内在修养的提升。而被高效率地生产出来的模式化的快餐文化产品进一步迎合了大众的浅层精神需求,更助长了人们由着本性喜好出发的价值追求,使人们享受处于价值自发阶段的逍遥而忘却推进社会进步的责任,阻碍了价值自觉的形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化抹去了社会责任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虚拟世界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消弭了道德的存在,加速了非理性的滋长。然而,文明是人类理性创造的果实,网络中的非理性是对文明的消解。这种非理性蔓延到现实社会,表现为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一部分人对别人的困难视而不见,另一部分人因为做好事付出的成本太大而不敢帮助别人,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滑坡,助人为乐的传统道德风尚被淡化,自然更无法形成以利他为核心因素的共同体价值自觉。

四、建构新型社区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新型共同体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是传统共同体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打造高品质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新型社区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建构这样的共同体及其价值自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实现机制:凝聚共同价值取向,重塑公共精神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的维系纽带在于利益二重属性的调和,即如何正确处理共同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6](P76)要重塑社区共同体,首先就要建立社区与居民的利益关联,挖

掘社区共同利益,凝聚共同价值取向。通过对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共同利益的满足,来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可和归宿感,进而重塑公共精神,为社区共同体的建立培育现实基础。

“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共同体有着强烈的渴求,而其中又以自由地创造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建立与他者的关联为第二需求。”^{[7](P5)}后单位时代,个体自由获得较大发展,但个体失去“单位共同体”的庇护,面临独自承担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困境,亟须构建新型共同体来提供个体自由发展的保障和支持,进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为其争取公平地享受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提供一个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这种内在对共同体的渴望,是形成社区共同体的内在动力机制。在现实社区共同体构建中,我们需要通过挖掘社区共同利益的策略,由政府引导和社会组织配合来将这种动机外化为具体的社区自治行动,通过对共同利益的追求,重塑社区成员与社区的紧密联系。

(二) 实施策略: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区居民自主参与度

新时代的特色社区治理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是以培育社区共同体价值共识来保障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治理,是以实现居民现代化为首要目标的治理。居民现代化的实现,意味着居民有权力也有能力主动参与到社区自治活动中来,而居民的主动参与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培育和提高居民主动参与度的主要策略有两个。

1. 通过赋权确立居民主体地位。社区治理经历了物质文明治理、制度文明治理阶段,最终必将走向以居民现代化为目标的“以人为本”治理阶段,因为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最终标志着社会现代性的完成。”^{[8](P4)}居民现代化意味着居民主体意识复苏,成为自觉承担社区责任,具备以公共精神为核心价值自觉的社区成员,也意味着居民将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

培育居民主体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需要通过赋权来实现,首先要赋予居民对社区事务治理的话语权,其次要赋予居民对社区资源的支配权。居民需要一个表达个体合理诉求的渠道,争取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赋予居民话语权和社区资源的支配权,一则可以为居民的合理诉求提供有效的表达渠道,促成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信任和依赖,增强居民与社区的联系;二则可以通过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激发居民对社区治理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确立居民在社区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居民获得话语权和资源支配权的渠道,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的专业指导。例如上海市浦兴街道的社区“协商民意测验项目”^[9],政府提供了社区自治金,并将资金的支配权交给了社区。而社会组织则提供了专业的操作方法指导,使得社区得以通过科学抽取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方法,将社区自治金如何使用、用在哪些项目中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赋予社区居民。

如上所述,各个社区特点不同,社区治理中既有共性问题,又有个性问题,政府阳光普照式的社区治理,无法照顾到社区的个性问题,社区居民才是社区问题解决的最终受益人,因此居民协商提出的急需解决的社区问题,才是社区居民真正关心的问题,赋予居民话语权和支配权才能切中社区治理的要害,激发出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主体意识,提高社区治理活动的参与度。

2. 党建引领下的多方协作,以“助人自助”方式推进居民自治能力现代化。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10]体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居民现代化不仅要通过赋权,当前更急切的是赋能。因为“信息不对称”^①状态的存在,使得居民对社区事务不能全面了解,更因为社区事务的复杂性使居民觉得无力参与,从而造成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只有当居民掌握了民主自治的技能和方法,才能够有效行使自治权力,才能够协调多元利益需求,从而形成社区价值共识,推进社区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形成,并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

通过赋权可以培育居民的主体意识,给予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理念,而赋能则能提高居民自治的技能,建立居民自治的信心,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因此,赋权与赋能相结合才能有效推进社区自治和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赋能需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协作,采用“助人自助”的赋能方式才能提升居民自治的能力。首先,需要社区党支部发挥组织覆盖优势吸引社区骨干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引导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向社区居民传授社区社会工作方法,让居民能够有效选择治理技术工具,推动社区治理技术的现代化。其次,需要社区党支部牵头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社区社会组织打造协作平台,从而提升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实现社区组织公益化。由熟知社区情况的本社区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来引导居民成立社区公益互助组织,搭建协同互动平台来实现居民的“互助”。通过提升社区自组织的公益性,来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避免出现因社区自组织的公益性不足,“特殊利益集团”借助组织载体扩大化进而侵占居民公共利益,加剧社区矛盾的情况出现。最后,需要发挥党建的政权优势为社区自治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加强对本社区社工的培训,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本地社工对社区情况更加了解,加强对居住在本社区社工的培训,不仅可以不断提高社工为社区服务的能力、保证社区社工服务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而且可以让社工在掌握社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具有社区特色的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三)平台建设:利用互联网构建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公共空间,重建网络时代的新公共生活

互联网的“脱域化”作用,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地域性关联,居民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形成当前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社区交往虚拟化等特点,导致社区公共生活缺失,引发了社区居民主体意识淡薄、社区公共活动参与度低、价值认同障碍等一系列阻碍社区共同体构建的问题。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互联网技术嵌入社区治理中,发挥社区的地域性优势和互联网的便利性优势,构建新公共生活,是重塑社区共同体及其价值自觉的有效途径。

1.利用社区地域优势,发掘社区特色公共文化,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打造新公共生活,为社区共同体及其价值自觉的重塑培育良好的人文环境。在社区建设发轫之初,各城市在划分社区时,基本是以社区成员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历史联系、心理认同感等相关因素为依据的,社区居民有较强的彼此互动型地域关联,具有形成特色公共生活的现实依据。例如上海浦东潍坊街道的“家园日”,通过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打造了居民自己的节日,它在实践中“将文化治理的理念贯彻进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激发社会文化活力和创造力”^{[11](P90)},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公共文化,构建出社区新公共生活,助推了社区共同体及其价值自觉的形成。

2.利用网络平台,凝聚社区地域资源,打造网络时代新公共生活,实现居民社会关系的再地域化。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智慧化手段打造的“北蔡易生活”^[12]便民服务平台,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创业团队建设、职能部门配合、社会资源参与、群众受益的开放式平台。它利用互联网的便捷优势将社区资源凝聚起来,引入社会组织服务,强化了社区公益性功能,构建了新型“智慧社区”,再造了社区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生活空间。线上,以微信公众号为依托,开发家政服务、健康咨询、社区资源发布等20余个功能模块,粉丝超6万余人,用户活跃度在70%以上;线下,在全镇居民区布置20座便民服务站,向居民提供政务、物业、缴费、配餐等12项服务。线上服务落地线下社区,“易生活”让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参与到了社区活动当中,实现社区居民交往的再地域化,增强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和凝聚力,为重塑社区共同体及其价值自觉打下了现实基础。

注释:

①信息不对称: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本文指居民相对其他治理主体而言的对社区信息掌握的有限性。

[参考文献]

- [1](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宋俊玲,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英)鲍曼.寻找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3](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 [4]张丽华,鲍宗豪.城镇去“浮萍化”与新型生活方式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16,(9).
- [5]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 [6]尹浩,舒晓虎.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主体性培育路径研究[J].求实,2018,(4).
- [7](美)弗朗西斯·赫塞尔本,等.未来的社区[M].魏青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8]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 [9]韩福国,等.民主如何可操作:上海城市治理首次“协商民意测验”[N].澎湃新闻,2015-06-10.
- [10]刘博,李梦莹.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J].行政论坛,2019,(2).
- [11]吴理财,等.以文化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
- [12]王沁.“北蔡易生活”:打造“互联网家”[N].浦东要闻,2017-02-06.

【责任编辑:陈保林】